



槟榔屿广福宫碑文与周边华人社群之关系探析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criptions of Kong Hock Keong Temple in
Penang and the Surrounding Chinese Community

刘雪琳

CELINE LOW

22ALB05523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5



槟榔屿广福宫碑文与周边华人社群之关系探析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criptions of Kong Hock Keong Temple in
Penang and the Surrounding Chinese Community

刘雪琳

CELINE LOW

22ALB05523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5 Celine Low.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e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v
摘要.....	vi
致谢.....	v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资料范围	2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与预计成果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6
第二章 槟榔屿的地理与历史背景.....	8
第一节 槟榔屿的开辟与发展	8
第二节 华人移民潮与社会影响	10
第三章 广福宫的建立与社区角色.....	13
第一节 信仰寄托	13
第二节 广福宫的创建背景与其社会功能	16
第四章 广福宫碑文研究.....	20
第一节 从广福宫的角度研究华人经济结构	20
第二节 广福宫碑文	24
结语.....	31
引用书目.....	33

附录	35
附录一 捐献者记录	35
附录二 广福宫	37

图目次

图 1: 1800 年《朔建广福宫捐金牌记》	25
图 2: 1824 年《重建广福宫碑记》	27
图 3: 1862 年《重建广福宫碑记》	29
附图 1: 1824 年捐献者名单与金额.....	35
附图 2: 1862 年捐献者名单与金额.....	36
附图 3: 广福宫现况	37

表目次

表 1：槟榔屿华人民口统计表（1820–1901） 14

表 2：嘉庆五年（1800）创建广福宫捐金记录 22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刘雪琳 CELINE LOW

学号：22ALB05523

日期：2025年9月12日

摘要

本文以槟榔屿广福宫及其碑文为核心研究对象，探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槟榔屿社会的形成及华人移民的历史进程。文章首先梳理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入驻后槟榔屿从荒岛到重要贸易港口的转变，分析自由港政策与地理位置优势如何促进国际商贸发展，并吸引大批华人移民下南洋定居，推动当地经济与多元文化形成。其次，广福宫的建立不仅满足了移民的宗教信仰需求，还在早期承担协调社群事务和调解纠纷的功能，体现了宗教场所在殖民地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本文对碑文的细读揭示了闽粤籍群体在经济层面及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也反映了商业资本对宗教建设的推动作用。碑文修辞显示华人逐渐将槟榔屿视为“第二故乡”，折射其身份认同的转变。整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宗教建筑与碑刻史料，呈现华人移民在槟榔屿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并为理解海外华人文化传承与社区建构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槟榔屿、广福宫、碑文研究、华人移民

致谢

匆匆三年，大学的时光稍纵即逝。在论文完成之际，我心中满怀感激与感慨。

首先，衷心感谢我的论文导师余歷雄老师。在论文撰写的每一个环节，余老师都给予我耐心的指导与悉心的教诲，使我获益良多。同时，余老师也是我的学术指导导师，不仅在论文写作上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更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给予了我真诚的关怀与建议。在我大学的重要节点上，余老师都为我指引了方向，让我获益匪浅。其次，感谢大学中遇到的每一位老师。您们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也让我对中文这门学科有了更深的理解与牵绊。

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我们从各自熟悉的地方汇聚到拉曼大学。我十分幸运能在这里结识一群知心好友。珮伊、彤薇、咨誼与馨贤，谢谢你们的陪伴与支持，让我的三年大学时光充满了温暖与欢笑。这段珍贵的情谊，将会是我记忆深处最珍贵的宝藏。尤其十分感激珮伊，在我论文撰写过程中，给我提供的技术帮助。

同时，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对我学业的支持与鼓励，这是我不断前行、坚持不懈的最大动力。

最后，再一次向所有在我学习与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良师益友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本文的研究动机源于笔者对南洋文化的推崇。南洋华人在生活困苦之际，毅然决然飘洋过海来到槟榔屿并在此扎根，以寻得更好的生活。移民的历程让笔者感到极度钦佩，并激发了笔者对南来华人移民如何在异国他乡生存的浓厚兴趣。因此，促使笔者以〈槟榔屿广福宫之碑文探讨其对南来华人的社区互动〉为研究课题，选用从广福宫碑文的角度深入地去了解南来华人的移民在异地扎根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区文化。

广福宫作为槟城（旧称：槟榔屿）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承载了早期南来华人社会的重要历史讯息。广福宫中的碑文作为时代的传承，记录了华人庙宇文化，与此同时也透露了当时社会的逐步发展，乃是极具历史性与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当前，在所搜集得来的资料中对于此碑文的研究仍有欠缺，所以笔者选择以广福宫内的碑文作为主要研究题材，希望可以针对碑文的研究从而挖掘并探讨更多南来华人与社区的互动以及见证十九世纪社会的发展。

同时，历史遗迹往往在时间的冲刷下逐渐老化也可能被外在因素损毁，广福宫内的碑文遗迹亦难免于此，同样面临着历史文化记录消失的风险。本文希望通过广福宫内碑文的研究，尽可能地在碑文还未被完全损毁之前，进行研究与记录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与资料。借此，通过研究以保护与传承属于南来华人的文化遗产，并将他们曾经为槟城的发展，所付出的努力更具象化地撰写及展现于人前。这也是笔者坚定选择研究该题目的主要动机。

本文的选题意义则是期望通过对广福宫碑文的研究，能够揭示在槟城的南来华人移民历史的发展脉络，分析庙宇在宗教信仰、社会互动与文化传承中承担的主要角色。这些碑文不仅是记录了捐资信息的文献，同样更是南来华人社会生活的历史缩影。本文将试图构建当时南来华人社区的生活面貌与发展过程，并探讨华人庙宇在此社区所担任的角色。此选题更是希望能为南来华人的历史与地方的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记录，以推动华人地方文化历史的发展。

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历史与文化的象征，但现代化的发展却导致文化遗产容易被忽视甚至破坏。槟榔屿广福宫的碑文作为南来华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槟城历史与南来华人社区发展的信息。然而，这些文化遗产面临老化、毁坏及被遗忘的危机。因此，这个研究主题更是希望能够引起公众对地方文化的重视与让其对自身的地方社区有更清晰的认知。通过研究与记录广福宫碑文的内容传递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使公众为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认同提供更大的帮助与支持。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资料范围

本文的研究是以槟榔屿广福宫的碑文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围。笔者希望可以通过对这些碑文的分析，探讨其在记录南来华人的移民历史和社区互动中扮演的角色。广福宫创建于 1800 年，乃是槟城历史最悠久的庙宇，也是早期南来华人社会中重要的宗教场所。因此，此研究将以 1800 年作为时间的起点，着重分析碑文中所反映的南来华人在迁入槟榔屿后，与当时社会进行互动的进程。尤其是从社会经济、历史事件、华人移民的文化融合作为本文的主要论述点。

此研究将探究广福宫碑文记录中捐资者的身份背景、社会地位以及籍贯，借此分析华人社区的发展，以及这些捐资者对槟城地方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笔者也将一并分析碑文中所记载关于庙宇进行修缮的缘由，与其中提及华人社区进行的活动，以探讨广福宫作为华人宗教场所的社区功能。笔者也相信从碑文提及庙宇修缮的历史中能够经此发掘出不同籍贯的华人对于社会、文化与信仰的融合。此外，碑文中捐资者的身份与籍贯信息将作为分析早期槟城华人移民族群的多样性和他们与槟榔屿社区逐渐融合的依据。

通过研究碑文的内容不仅可以对早期槟城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发展有更深的了解，并且还能探讨广福宫这座百年庙宇在华人移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如何让不同籍贯的华人相互产生凝聚力，塑造融洽的华人社区。

资料范围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材料种类与来源，这些材料构成了研究的基础，将直接影响研究所得成果的准确性。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实地考察与文献收集以等方式对广福宫碑文的社会意义进行解读。本文的主要研究资料为槟榔屿广福宫内现存碑文的内容与数据。通过实地考察，笔者将记录与分析碑文中的捐款记录、庙宇重修的缘由以及从中所透露的社会信息。经过探索此资料范围，期望能够进一步揭示早期槟城华人社区发展历程与其对地方社区有做出的贡献。

其次，为了进一步补充与论述碑文研究的结论，本文的撰写亦会选择参考从拉曼大学图书馆收集而来的方文化研究类的文献。其中的文献有：学者张少宽的《槟榔屿丛谈》、学者谢诗坚的《槟城华人两百年》和学者王琛发的《广福宫：历史与传奇》等。这些文献记录了槟城华人移民史、与地方文化的发展进程，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对槟城华人背景的协助和相关的社会历史。此

外，在学术论文方面，学者陈剑虹的〈槟榔屿广福宫史话〉则为此研究提供了与广福宫相关的研究成果，是本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这一篇学术论文的引用将有助于提升本文的可靠性，让此研究成果得以更为完善。故此，本文的研究将引用以上的文献作为参考与辅助，并采纳多方面的学者论点以作论述。

不仅于此，为了更进一步与更深入地了解与研究此庙宇碑文，本文将会采用田野调查法，通过对庙宇实地环境、碑文位置与保存状况的记录，补充文字资料的不足。同时，结合对庙宇相关的文献作系统的整理，旨在获取碑文中未能完全呈现的细节信息，例如槟城华人社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运作模式、广福宫在地方社会中的功能和角色等。通过多渠道资料的对照与分析，本文力求更全面地展示槟城华人社区的发展与变迁。

通过碑文、地方文献与田野调查的资料的综合分析，本文将尝试重构从广福宫碑文所反映的华人移民在槟城社区早期的生存轨迹。此研究也期望能够完善从 1800 年广福宫创建之始的华人移民生活轨迹与社区发展的历史，并提供更为详细地研究视角。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与预计成果

槟榔屿广福宫作为槟城的古庙之首，乃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历年以来关于槟榔屿广福宫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庙宇的建立和建庙资金的方向。学者张少宽就在《槟榔屿华人史话》中探讨了广福宫的创建背景与其董事的资料。¹在《槟榔屿丛谈》中提及的“广福宫的超地缘助缘记录”谈论的则是不同籍贯的

¹ 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2），页 86–87。

华人移民的捐款数额与捐款人的身份。这方面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籍贯的华人通过广福宫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种联系。²

同样，傅吾康、陈铁凡合编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详细记录了广福宫碑文的原貌，不仅完整誊录碑文内容，还保存了捐献者的姓名和捐款金额³，为后人研究广福宫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资料。碑文中详细记载了广福宫的创建与重建过程，以及各次募捐活动的具体情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值得珍藏与研究。此外，王琛发在《广福宫：历史与传奇》中对碑文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⁴，使笔者对碑文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为后续撰写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发。学者陈剑虹在论文〈广福宫与槟城华人社会〉中的“广福宫十九世纪角色的演变”记录了广福宫在当时社会所扮演的角色。⁵通过学者陈剑虹的撰写，笔者对于广福宫在各个时期的定位与功能都有了初步的了解。

前人的研究方向为这个研究课题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从广福宫内的碑文角度去看南来华人的社区互动的研究是较为稀缺的。现有的文献资料多数停留于对碑文的记录和解析，却缺乏以碑文内容的视角来关注十九世纪南来华人与社会互动的研究。不仅如此，尤其是通过碑文的角度去剖析南来华人的移民轨迹以及时代背景发展的研究也同样不多见。因此，就以上提及资料的不足，本研究将结合使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如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等，更加深入地论述从碑文的内容探讨其对南来华人社区的互动与历史发展的过程。

²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5），页 21–25。

³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5），页 526–541。

⁴ 王琛发，《广福宫：历史与传奇》（槟城：槟城州政府华人宗教事务理事会，1999），页 5–18。

⁵ 陈剑虹，〈广福宫与槟城华人社会〉，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页 99–114。

本文的预计研究成果是通过对广福宫碑文的分析，进一步揭示槟榔屿华人移民的历史脉络，探索移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迁徙轨迹以及其与本地社区产生互动的过程。同时，此研究希望结合碑文中的内容能够分析广福宫作为华人庙宇在促进不同籍贯华人的社区互动中的所产生的作用，并且探讨其对华人社会凝聚力的影响。以上亦有提及关于从广福宫内的碑文角度去看南来华人的社区互动的研究是略显不足的，所以本文希望通过碑文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与探讨该题材，用于补充与丰富十九世纪南来华人与本地社区的发展轨迹。再者，本文更期望在通过研究广福宫碑文所展现的南来华人和社区互动历史的过程中，能够逐步加强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并激发公众对自身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

第四节 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将采用文献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以探讨论文的研究主题。文献分析法指的是通过收集和研究与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其所阐述的内容进行归纳及解读，从所得的资料中提取出对研究问题相关的观点。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将选择以广福宫内现存的碑文作为主要研究材料，详细分析其中内容。广福宫内的碑文作为一手历史文献，记录了捐资人员的姓名与捐款记录、修缮庙宇的原因和建庙背景等重要信息。这些重要信息侧面述说了广福宫发展过程亦为研究华人社区发展的轨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除此之外，本文的撰写将一并使用与研究题目相关的书籍与学术论文等资料，通过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以此完善本文的观点。笔者将参考学者张少宽的《槟榔屿华人史话》、《槟榔屿丛谈》、学者王琛发《广福宫：历史与传奇》、学者谢诗坚的《槟城华

人两百年：写下海外华人历史第一页》与学者陈剑虹的《广福宫与槟城华人社会》等学术著作，用于弥补碑文资料的局限性，也将使研究的视角更加全面。

同时，本文也将使用历史研究法，此研究方法是笔者通过收集历史文献、碑文、古籍等资料从而进行分析与解释的研究方法。因此，笔者希望能够从广福宫碑文上的内容资料去探讨槟榔屿与华人移民的历史背景。通过碑文内容揭示华人移民在槟榔屿筑根的生活痕迹与历史轨迹，并探索不同籍贯的移民与族群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此研究法尚可让笔者从研究广福宫碑文的角度去探讨当时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的境况。再者，笔者也希望能通过此研究方法考察槟榔屿广福宫作为最早期庙宇的建立与发展，并从此来探究槟榔屿华人移民的轨迹。笔者相信历史研究法的使用可以帮助本文通过对碑文内容的研究，揭示其与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产生的联系。与此同时，尚可用于分析广福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区角色变化。

不仅如此，本文的撰写也将使用田野调查法作为其中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指的是研究者亲自到访研究课题所在的地点以实地考察、访谈、问卷调查等等的方式，直接收集第一手的资料。这个研究方法不仅有助获得具体而真实的研究数据，更能帮助研究者深入地了解当前的该社区的互动与文化背景。因此，为了此项研究，笔者将驱车前往位于槟城的观音亭广福宫进行实地考察，为了亲自寻找本文撰写中所需的庙宇碑文。笔者将对庙宇的建筑现况、碑文的保存状态以及碑文的内容进行细致的观察，并通过拍摄以记录下碑文的重要信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田野调查法是为了可以观察碑文的现况与通过碑文的角度探索广福宫与华人社区的互动，同样希望可以让本文所研究的内容更为充实。

第二章 槟榔屿的地理与历史背景

第一节 槟榔屿的开辟与发展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到来之前，槟榔屿隶属吉打，当时岛上人口稀少，居民以渔民为主。根据记录 1786 年之前槟榔屿上就已经有 58 个渔民了。其中为人熟知的分别为张理、丘兆祥及马福春三人，早在 1745 年已来到了槟榔屿，在丹绒道光（Tanjong Tokong）以捕鱼为生。后来在三人逝世后，就化身成为了“大伯公”。⁶1799 年建立于海珠屿的大伯公庙就是由此而来的。⁶这段带有神话色彩的历史传说，反映了槟榔屿早期社会的民间信仰文化，并对其日后浓厚的东方文化特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上的论述同样表示了，那时候槟榔屿的人口是分散且鲜少的，而这种零散的人口分布，将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到来，随着移民潮的涌入而发生了变化。

槟榔屿的地点处于马六甲海峡的要冲，其坐落在印度孟加拉湾、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重要航道上，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与此同时，槟榔屿的港口不仅可以作为季候风期间的避风港，更便于英国商船往返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这个地点也为英国海军提供战略基地，用以抵御荷兰与法国海军的干扰，巩固其在东南亚的海上势力。⁷由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看中了槟榔屿这片土地，并于吉打苏丹交涉并且在 1791 年 4 月 12 日

⁶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槟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2012），页 7。

⁷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页 11。

时，双方交战了四天四夜，最终吉打防御失败，并在 1791 年 5 月 1 日签下了“城下盟约”确定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槟榔屿的占领。⁸

由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莱特上尉（Francis Light）正式将槟榔屿开辟为通商港口，并将其纳入英国的殖民体系。这一个举动迅速地提升了槟榔屿的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为其带来了更多经济发展的契机。港口的开放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商贾，也为寻求生计的移民提供了落脚点。

莱特自开辟槟榔屿起，便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将其设为免征进出口关税的自由港。这一举措显著降低了贸易成本，吸引了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及东南亚的商人，使槟榔屿迅速崛起为马六甲海峡的重要贸易枢纽，并带动了海外移民的不断涌入。与此同时，自由港的建设也使槟榔屿成为印度通往中国的重要转运点，在英军的保护下，马六甲海峡逐渐发展为畅通无阻的国际航道。

莱特：“提倡自由贸易以发展商业的计划，已见成功，以为可照此进行。不必更变。”虽然如此，莱特还是有对货物进出口课以税务，以支付开支。但到了 1796 年，他的继任者麦唐纳鉴于情况复杂，取消了入口税，让槟榔屿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自由港。⁹他所推行自由港政策，旨在通过贸易迅速带动乔治市的繁荣，而这一政策也直接地促成了华人移民潮的形成，并且深刻影响了槟榔屿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

⁸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页 10。

⁹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页 31。

第二节 华人移民潮与社会影响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引入更多的外来移民以开发槟榔屿这块土地，更是放松了土地与居住权的制度。莱特为了让这个地区迅速发展，他还执行了土地开发政策，有效地使槟榔屿得以发展起来，耕种地也逐渐扩大。华人被鼓励耕种的农作物有胡椒、丁香、豆蔻、槟榔、甘蔗等等。这些农作物也成为了华人的主要经济基础。殖民政府通过允许华人、印度人、其他族群自由在岛上经商和居住，大幅度地让该地区的经济有所增长。同时，更甚在部分地区开放土地租赁和买卖，鼓励外来移民在槟榔屿安家落户。

因此莱特为了槟城的发展，在登陆槟榔屿之后，就不得不引进更大量的劳工。他在 1786 年 10 月 1 日的报告中提及：“我们的居民增加得很快，有印度人、华人及洋人，他们已存在对土地的争执，每个人都尽力和尽快地建设。”¹⁰

莱特推行的各个政策不仅仅是为贸易经济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对海外的移民造就了一个很好的落脚地。其实，中国人的移民浪潮，在晚清时期尤为强烈。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英国迫使中国放开门户，直至第二次的鸦片战争，也就是 1856–1860 年间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后，清朝首次承认了“个人有更换其故乡及归顺的固有与不能限制的权利。”因此造成了在十九世纪初，中国因政治动荡、战乱与饥荒等因素，民生困苦，导致大批华人选择“下南洋”谋求出路。同时，当时的槟榔屿在英国殖民政府的鼓励下，向外来劳动力与商贾敞开门户，成为华人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莱特十分看重“华人”，在 1794 年，他曾向他驻于加尔各答的上司提出：“华人成为我们居民

¹⁰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Penang Past & Present* (Penang: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1996), 1.

中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 3000 人，各个从事不同行业，有木匠、石匠、金匠、店员、商人、农民等。”¹¹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对华人的重视，不同的职业可以对槟榔屿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而男女与儿童则侧面反映了这些华人是决定在此长住及定居的。

莱特也曾提及：“他们永不疲倦地追求金钱，并于欧洲人一样，花钱购买东西以满足自己。他们不等待筹足了钱回到祖地，而是每年将所得部分寄回给家乡的家人。”¹²显然，他对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存在是抱有高度期待的，他极为赞赏华人的辛勤和才能。同时，他也认可华人不是一味将所赚取的钱财全部寄回家乡，而是在当地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乐于花费以满足自我生活需求的。

不仅如此，莱特更提及了华人“好赌”这一方面的情况，在常规角度来看赌博行为是一种较为负面的行为，但在莱特看来反而并不。在政府收入低迷之际，华人正是政府的收入来源，莱特设立饷码制度，在烟、酒及赌博方面征收税收以弥补政府的开支问题。他认为利用华人的嗜好来征得税收是最显著的方法，而华人在槟榔屿生活下所提供的经济流动，更是大大凸显了华人移居到槟榔屿的重要性。

虽然，华人对当时的经济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同时，莱特也看出来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将会产生的隐患。莱特认为华人所使用的语言是非他人所能理解的，所以使得他们可以拉帮结派以私会党的方式以作结合。这样一来，华人会

¹¹ 原文为“The Chinese constitute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our inhabitants; they ar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bout 3,000, they possess the different trades of carpenters, mason, and smiths, are traders, shopkeepers and planters.” 引自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44.

¹² 原文为“They are indefatigable in the pursuit of money, and like the Europeans, they spend it in purchasing those articles which gratify their appetites. They don't wait until they have acquired a large fortune to return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but send annually a part of their profits to their families.” 引自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244.

有自身的语言优势以方便他们沟通并秘密策划反对政府所颁布的法令等等，对当地的社会安全有威胁。事实也证明了，莱特的猜想并非空穴来风，华人族群渐渐以方言和籍贯区分私会党，而私会党的势力也大到了几乎操控整个社会的机制，尤其是华人社会。尤其从 1867 年 8 月 3 日至 14 日为期 10 日的义兴与大伯公（建德堂）私会党对于普吉岛锡矿之争的大械斗便可知道华人私会党对社会安全的危害。¹³此事的发生，让英政府派出军警镇压，又劝两党领袖出来维持秩序，持续到 8 月 15 日械斗才停止。这次的暴动造成了人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前提也是因为争夺金钱利益。由此可见，莱特的担心不无道理。

由此，华人族群的到来尽管在莱特看来带有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华人所能带给这片土地的利益却是当下最不可忽视。因此，莱特还是决定大力引进华人劳工，而事实证明华人工种的多样化和消费能力被视为了推动槟榔屿经济的重要力量。“华人”族群勤劳与务实的精神给槟榔屿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质的变化。这些南来的华人在此落地生根，逐渐形成了多元化且充满活力的社区，为槟榔屿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注入了重要动力，使这片土地成为不可或缺的贸易与文化中心。

¹³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页 67。

第三章 广福宫的建立与社区角色

第一节 信仰寄托

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大力推动槟榔屿的开发，华人移民来到这片土地谋生定居的数量也愈来愈多。在陌生的环境中，他们不仅奋力改善生活，也在族群大量聚集的情况下逐渐将自己的文化和习俗带来了槟榔屿。其中最具凝聚力的乃是“信仰”。随着华人社区不断地在扩大，对于宗教和精神寄托的需求也愈发显著，这也为了后来庙宇的建设与华人社会的结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华人而言，在中国的信仰文化里，对神明、祖先与鬼魂的崇拜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人们看待这些对象之时，都保持着敬畏与崇敬之心。至于对远渡重洋的海外华人而言，信仰不仅是宗教情感的寄托，更是一种心灵慰藉。庙宇、祠堂、义山等信仰空间，不仅重新连接了他们与神明、祖先之间的联系，也成为维系社区情感的重要节点。当初南下的华人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来到异乡，初期多为应付生计而奔波，难以顾及精神层面的需求。然而，随着生活逐渐安定，他们对于信仰和精神需求的向往也渐渐涌现，成为他们在异地扎根过程中的重要依靠。

年份	华人人口	总人口	华人所占之百分比
1820	8,595	35,034	25%
1830	8,963	33,959	26%
1842	9,715	40,499	24%
1851	15,457	43,143	36%
1860	36,222	124,772	29%
1881	67,820	190,597	36%
1891	87,920	235,618	37%
1901	98,424	248,207	40%

表 1：槟榔屿华人人口统计表（1820–1901）¹⁴

资料来源：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页 4；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81, p.166;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881, p.21;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891, p.43;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901, p.19.

说明：1830 年和 1842 年的统计，只限槟榔屿本岛而已。

以上对于槟榔屿华人人口的统计，可以清晰地看出从 1820 年开始，在槟榔屿的华人的总人口不停地在攀升。在 1820 年，槟榔屿的总人口有 35,034 人，而华人人口就已有 8,595 人，华人占比 25%。接着，在十年间，1830 年槟榔屿的总人口对比前十年有了些微的消退，但华人人口却从本来的 8,595 人提升到了 8,963 人，虽然在占比上只多了 1%，但却可以看见华人人口正在悄悄增长。

¹⁴ 张晓威，〈十九世纪槟榔屿华人方言群社会与帮权政治〉，《海洋文化学刊》2007 年第 3 期，页 116。

1842 年，总人口增长至 40,499 人，华人数量为 9,715 人，占比虽降至 24%，但总体人数依旧上升。1851 年，槟榔屿总人口有 43,143 人，而华人人口在这几年间增至 15,457 人，百分比也从原来的 24% 上升至 36%。来到 1860 年，单看华人人口所占的百分比比起 1851 年有了下降的趋势，但事实却是 1851 年至 1860 年间，槟榔屿的总人口数量暴增，从原本的 43,143 人增至 124,772 人，华人的人口数量也从本来的只有 15,457 人增至 36,222 人，在短短的 10 年间翻了个倍。1881，1891 至 1901 年这三年期间不管是槟榔屿总人口的数量抑或华人人口的数量都呈稳步增长趋势，不再逐一赘述。

根据颜清湟在《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的研究中说明了，港口城市的设立使华人移民更容易与外界进行接触及能够与家乡中国的港口作联系。它为居民成员提供了更大幅度的流动。¹⁵这也使得这些海外的华人移民更无后顾之忧，港口城市不仅为华人移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同时更容易让他们感到安心，因为与家乡的联系并不遥远。由此可见，这与华人人口的增长有莫大的关系。

同时，钟临杰在《西马华族人口变迁》中也阐明了，西马当时的大片地区仍然被森林覆盖，瘴气盛，环境不佳，疾病肆虐，再加上医疗设备的缺乏，导致出生率低下，死亡率高的问题。¹⁶由此可见，虽然华人移民已逐渐移入西马区域包括槟榔屿，并在当地落地生根，但却未必是华人人口大量增长的缘由。故华人人口的数量节节攀升更多是来源于大量的人口移入。槟榔屿的华人人口因港口贸易繁荣及英国殖民政策息息相关。

¹⁵ 颜清湟，〈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林水壕、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5。

¹⁶ 钟临杰，〈西马华族人口变迁〉，详见《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页 207。

在近八十年间，华人人口从 8,595 人增至 98,424 人，从百分比来看更为明显，从当初的 25% 上升至 40%，近乎占了槟榔屿总人口的一半。这一趋势印证了英国殖民政府积极引入华人劳工和商贾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成效。同时，随着华人人口迅速增加，华人社会对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后续庙宇的建设和华人社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广福宫的创建背景与其社会功能

为了稳定与安抚这些对槟榔屿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华人移民群体，英国东印度公司采取了怀柔政策，特意拨出一块土地，作为建庙之用，此举也在客观上回应了华人的信仰需求。嘉庆五年（1800 年）立下的这块《剏建广福宫捐金碑记》¹⁷证实了，槟榔屿椰脚街的观音亭广福宫始建于 1800 年迄今为止已有 225 年历史，是乔治市最早建立的庙宇之一。

经过探访与研究，笔者发现广福宫共有六块碑文，其一就是《剏建广福宫捐金碑记》。随后在 1824 年立下《重建广福宫碑记》及捐资者姓名碑文；1862 年亦再次立有同名碑记及捐资者芳名碑。最新的一个碑文则为 2017 年 6 月 8 日立下的《重修广福宫碑记》。

广福宫创庙初期的工作由黄金銮与曾青云两位董事负责监督。此庙以供奉观音佛祖为主。广福宫之所以称之为“广福宫”则是因为其是由两省人民共同建设的，领袖均为广、福成员。其中的“广”指的是籍贯为广东的华人；而“福”则是指籍贯为福建的华人。但另有说法是指“广福宫”的名字来源于

¹⁷ “剏”：异体字，现改为“创”。

“广种福田”，在佛教中寓意“广植善因，以期获得福报”是佛教中重要的概念之一，教人广结善缘。

笔者则更偏向于“广福”二字乃代表广东与福建两个籍贯的人民。另在《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 188 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的刊物中为特刊献词的广东暨汀州会馆会长赖亚汉也曾提及：“广福宫取名“广福”系因“闽粤”两省善信所设之故。¹⁸综上所述，结合建庙者的籍贯构成与社群领导的结构，“广福”二字源于广东与福建两省之说的依据更为充分，而赖亚汉先生在刊物中的献词也为此观点提供了印证。

前文已指出，对于远赴南洋的华人移民而言，庙宇不仅是一个执行宗教仪式的神圣场所，更是一个被赋予了社会与文化交织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在早期槟榔屿华人社会中，庙宇的存在不仅维系着信众与原乡宗教传统的联系，承载着华人群体的精神寄托，也通过日常祭祀、庆典活动和宗教象征，强化了族群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广福宫在这一背景下被视为信仰中心，不仅满足信徒祭拜、祈福、求平安的需求，还在社会功能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了社区的事务讨论、华人族群组织聚集的核心场所。由此可见，当时广福宫本身的意义已超越单纯的宗教范畴。

广福宫信理部主席谢仁忠的致辞中也敲定了广福宫的社会功能：

“在过去两百年来，槟榔屿广福宫是北马区华人社会的宗教生活与信仰中心，也曾经在历史上扮演过华人信仰生活的重要支柱，由广东暨汀州会馆与福建公司派出的代表组织广福宫信理员，几乎可以代表槟城各籍贯华人的绝大部分。”

¹⁸ 赖亚汉，〈献词〉，陈剑虹主编，《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 188 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槟城：广福宫信理部，1989），页 11。

分，正说明它和整个华社的历史渊源，以及它在华人社会的重要地位。”¹⁹由此可见，广福宫对于华人社会的影响是不可轻视的。

早在 1800 年，槟榔屿的华人，就存在福建与广东两大帮派。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处理“华人的事务”，他们共同组成广福宫，作为“华社的政府机构”。²⁰在 1862 年《重建广福宫碑记》中更有提及：“居常则祈福延禧，共逐家庭之乐，有事则解纷排难，同消雀角之争。”²¹由此证明除了信仰问题之外，广福宫更是扮演了华人社会调解方，具有协调各派华人利益和纠纷的作用。不仅如此，广福宫的地位也从一份地契中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的认证。1838 年，广福宫获得由东印度公司发出列号为 2420 的永久地契一份，总括前后二进及周围土地，计 24169 方尺，归为市区 T.S.19LOT71。²²这一份地契不仅仅是一纸法律文书，更是象征着东印度公司对于这个华人核心机构以及其所拥有土地的合法性的证明，为其作为仲裁管理中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广福宫作为宗教与社区交汇的场所，极大增强了华人社会的凝聚力，使这些华人移民对槟榔屿这片陌生土地产生了归属感。其不仅满足华人移民的信仰需求，成为他们在异乡生活中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寄托。这相信也是东印度公司愿意捐出土地建庙的重要因素。庙宇在稳定华人群体、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通过支持庙宇建设，不仅有助于安抚并管理庞大的华人移民群体，还能间接推动商业港口的繁荣与殖民统治的稳固。

¹⁹ 谢仁忠，〈献词〉，见王琛发，《广福宫：历史与传奇》，页 2。

²⁰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页 57。

²¹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5-537。

²² 陈剑虹，〈槟榔屿广福宫史话〉，《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 188 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页 34。

1825 年，帮会组织诞生，而华人两派帮会因利益问题常常公然斗殴，殖民地政府最开始抱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打斗战况却愈演愈烈。最终，殖民地政府在 1881 年促成平章会馆的设立²³，作为协调华人私会党争与内部纷争的官方平台。从此，平章会馆逐渐取代并接管了广福宫在仲裁与管理方面的社会功能。这意味着广福宫失去了充当仲裁所的作用，其功能便回归到专门为华人社群祭拜祈福、安抚民心的宗教场所上来。

综上所述，广福宫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转换，既曾经是承载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的核心场所，也一度在华人社会治理与政治协调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其的仲裁功能随着平章会馆的成立而逐渐式微，广福宫却始终作为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延续至今，成为了槟榔屿华人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其碑文、地契等历史记录不仅见证了华人族群跨越世纪的文化传承，也反映了殖民地政权、华社组织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

²³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页 62。

第四章 广福宫碑文研究

碑文的存在乃是一种历史的载体，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用于记录和传承过去曾经发生的事迹和文化等。它以石刻文字的形式，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事件、文化信仰与群体活动定格住，留给后人提供了追溯与解读的可能性。广福宫的碑文作为槟榔屿华人社会早期的重要史料，不仅反映了庙宇的建置沿革，也投射出当时华人社会的经济状况、族群关系与社会结构。本文将以广福宫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槟榔屿早期华人的经济形态及族群组织结构。

第一节 从广福宫的角度研究华人经济结构

槟榔屿广福宫自 1800 年创立以来，至今共立有六块碑文，这些碑刻大多都是因为庙宇的创立、重建以及筹款而设的。其中内容就涵盖了庙宇的修建缘由、建筑规模以及热心捐献者的姓名记录。碑文不仅记录了广福宫的发展历程，也直接反映出了早期槟榔屿华人社会的经济实力、族群关系与社会结构，是研究当地华人社会的重要历史资料。本文将以广福宫碑文中的捐献者名单为切入点，尝试分析不同籍贯群体、社会阶层在庙宇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导致部分碑刻，捐献者籍贯、身份、社会背景等信息的完整性有所欠缺。笔者在研究中将尽可能收集与整合不同来源的资料，并对捐献者信息进行分类和归纳，以整体视角呈现早期槟榔屿华人社会的经济结构。笔者并无按照碑刻立碑的年份或重建事件进行线性叙述，这个叙述方式可以弥

补了史料不完整的问题，也有助于从整体的经济活动来揭示当时华人群体的阶层分布。

从广福宫的碑文资料中，可以看到多位具有重要社会地位的华人精英积极参与庙宇建设。在 1800 年创建广福宫捐金碑记上的缘首就有二人，一为蔡甲必丹，一般被认为他是马六甲的蔡士章。他是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谢仓人²⁴，为创建广福宫慨捐了二百元。

其二就是吴甲必丹，他的身份历来存在争议，陈铁凡认为，他极有可能是泰国宋卡的福建籍城主吴让的弟弟文辉。碑刻立于嘉庆五年（1800），正值吴家势力鼎盛，因此其以崇高社会地位捐献二百元十分合理。²⁵

根据学者张少宽在研究广福宫的超地域性捐献人的记录里，得到了以下数位捐献人的资料和捐献信息。从创庙初期负责监督工作的两位董事黄金銮与曾青云开始说起。黄金銮，1805 年给福建义冢增建纪念碑记上，助捐了三十二元，推断他是福建人。²⁶而曾青云，一般相信他是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²⁷同时，他也在 1800 年广福宫创立之时捐赠了一百二十七大元零八钱。²⁸接着是捐献者梁壬癸，他祖籍福建省泉州南安市，在 1800 年创建碑记中被记录捐款二十五元，而在 1824 年广福宫进行重建之时也捐了二十五元²⁹，显示出他对庙宇事务的积极性。继而，来自福建漳州的陈送，据说生于 1763 年，于建庙之初捐赠五十元。

³⁰ 广东籍的胡德寿则在 1800 年建庙时慷慨解囊，捐献高达一百元。³¹

²⁴ 阮湧伽、侯慧雯，〈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蔡士章与宝山亭之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2020 年第 1 期，页 47。

²⁵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22-23。

²⁶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22。

²⁷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22。

²⁸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27。

²⁹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23。

³⁰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23。

³¹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23。

值得注意的是，在 1824 年重建广福宫的捐献名单中，来自福建南安的梁美吉尤为突出。他不仅是马六甲青云亭的第一任亭主（1824–1839），更为广福宫重建捐献了一千大元的巨额资金³²，借此也反映出其在当时华人社会的经济地位与影响力。陈天福，陈三柔，杨金水，皆为福建人，分别在 1824 年重建广福宫之时捐赠了三十元、十六元及十元。³³虽然捐款金额不大，但同样体现了普通信众对广福宫建设的支持。

另外，学者陈剑虹在〈广福宫与槟城华人社会〉中曾经分析得出了嘉庆五年（1800）创建广福宫捐金记录的表格。

捐金者	数目	百分率	数额	百分率
福建省籍	229 人	50.4	2587.61 元	68
广东省籍	219 人	48.2	829.83 元	22
商业单位	6	1.4	386 元	10
总数	454	100	3803.44 元	100

表 2：嘉庆五年（1800）创建广福宫捐金记录³⁴

根据以上的表格从人数和捐款数额两个角度的呈现了早期槟榔屿华社的籍贯分布及财富的结构。从创建广福宫的捐金记录中可以看出福建省籍的华人数量有 229 人而广东省籍则有 219 人，两者人数相差无几，反映出早期间、粤移民群体在人口数量上的分布是相当均匀的。但再从捐金数额方面观察，却有不一样的结果，福建省籍 229 个捐赠人中筹得了 2587.61 元，占了总百分比的 68%。

³²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24。

³³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24。

³⁴ 陈剑虹，〈广福宫与槟城华人社会〉，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页 100。

另一方面，广东省籍的 219 个捐赠人当中仅筹得了 829.83 元，占总百分比的 22%。福建省籍与广东省籍的捐款人数仅差 10 人但捐款数额却相差 46%，远远的拉开了两方的差距，显示出显著的经济实力差距。

另外，王琛发在《广福宫历史与传奇》中也曾提及，在捐款名单中，发现了 215 名捐款人的名字都依照福建人的习俗加上了“官”字的尊称。这些人都在捐款六元以上的捐款者中，并占绝大多数，侧重说明了福建籍贯的群体可能是较为富裕的社群。³⁵

至于两个籍贯之间经济差距的个中原因，学者张少宽在《槟榔屿丛谈》中也提出了解释。在早期的时候，华裔移民是以广东、福建两帮派为主，而闽、粤籍民可以在各自的环境下过生活。广帮的人民多数从事于种植业、手工艺或者建筑领域的劳动工作等；至于福帮的人民则是经商者居多。³⁶广东人民数量虽然与福建人民不相上下，但因为不同的工作职业形成了薪资的差距，从而反映在这个创建广福宫的捐金记录上。

不仅如此，根据 1800 年的捐献名单和金额中有一些商业单位的捐献是不容小觑的，如胡永茂酒廊捐赠了一百二十大元，赌公司捐赠了一百大元，烟景公司捐了一百大元等等。³⁷从字面上就能推断出，这些商业单位主要是经营烟酒与赌博生意的。由此可见，莱特在以上提到华人“好赌”，但更能因嗜好而带动经济流动之事有了实证。这也侧面反映了早期华人移民的私生活，与“烟、酒、赌”脱不了关系。因此，这些从事烟酒赌博生意的商业单位在捐献上出手之阔

³⁵ 王琛发，《广福宫：历史与传奇》，页 6。

³⁶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页 10-11。

³⁷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27。

绰足以证明，他们所赚取的利益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也相等于更进一步反映了商业资本在宗教场所与社会结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此看来，广福宫创建时期的捐款记录不仅反映了早期槟榔屿华社中广、福两帮移民的人口比例，更揭示了不同籍贯群体的财富分布与经济结构差异。福建籍贯的群体凭借经商优势和较高的经济实力，在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广东帮虽人数相当，但经济贡献相对有限；而商业单位的大额捐款，则突显了特定行业在槟榔屿经济中的地位。这些史料为研究槟榔屿早期华人社会的阶层分化、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质依据。

第二节 广福宫碑文

广福宫的碑文不仅记录了捐献者姓名和捐款数额，它所呈现的信息也为研究 19 世纪槟榔屿华人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除了揭示了华人在经济结构上的分布，其中碑文的内容也展露了许多当时社会的发展现象和状态。基于此，笔者将进一步剖析碑文内容，以探讨其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趋势与文化特征。

上文中已提及，广福宫的碑文总共有六块，分别从 1800 年的《剏建广福宫捐金碑记》至 2017 的《重修广福宫碑记》。其中包含实质信息内容的有四块碑记。本节将重点讨论 1800 年至 1862 年的碑文。至于 2017 年的碑记，由于时间上相距甚远，与前期碑文在历史环境和连贯性上差异较大，因此不在本章讨论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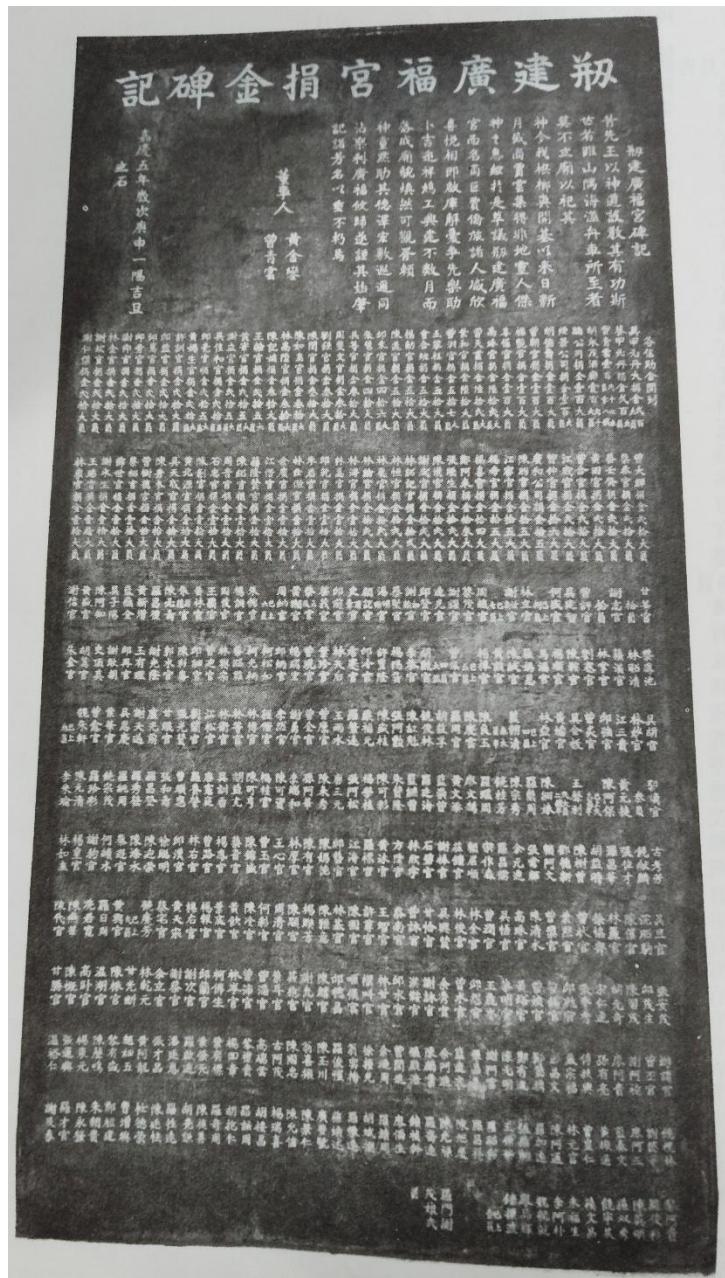


图 1：1800 年《创建广福宫捐金牌记》

槟榔屿广福宫是 1800 年创立的，而其的第一块碑记《创建广福宫捐金牌记》也是因创立所留下的。创建之时，立此碑文的广福宫董事人为黄金銮与曾青云二位。碑文中不仅记载了创立背景，也包含了对广福宫选址、建造过程及捐献者群体的描述，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其所反映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碑文上所记载的“舟车所至者”³⁸，指的是在广福宫建立的位置就在处于靠近港口的上下岸之处。广福宫作为海外华人移民的信仰之地，建立在了靠近港口之处，这个选址可谓是最合适不过，陆续移民过来的华人在下了港口就可看见象征信仰与依托的庙宇，犹如定心丸一般让他们更有在槟榔屿落地生根的憧憬与慰藉。

此外，根据碑文，广福宫要“卜吉迎祥”³⁹才能够兴建，而且也表明了“不数月而落成”。⁴⁰“卜吉”即是择定吉日吉地，这一环节凸显了华人社群对兴建事宜的极度重视。同时结合以上列表中所提及的捐款人和捐款额度之多，花了数月进行筹款，可见得这座庙在筹备建立之时，便不可能是一所简陋的建筑。碑文上“广福攸归”⁴¹的字样，也证实了广福宫乃同属广东与福建籍贯人士共有。由此可见，广福宫在创建之初，就不仅是一座信仰场所，也体现了早期槟榔屿华人移民的社群生活。

³⁸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26。

³⁹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26。

⁴⁰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26。

⁴¹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26。



图 2：1824 年《重建广福宫碑记》

继 1800 年的创立碑之后，1824 年的《重建广福宫碑记》记录了华人社群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庙宇的进一步修建诉求。槟榔屿在二十多年间逐渐发展，华人社群亦然。自 1800 年初建后，1820 年至 1830 年间华人人口数量确实是有

攀升的趋势（参考表1），原有的庙宇已“规模未广”⁴²，无法满足需求了，需要再进行扩建了。再者，广福宫最初是为了解决华人移民的乡愁和信仰需求而建筑的，但随着他们在槟榔屿逐渐安定了，对这座庙宇也有了更高要求了。正如碑文所说的“非洁清不足显慈光之普照，非宏敞不足尊神圣之庄严”、“美轮美奂”。⁴³显然，华人社群意识到了广福宫的规模不足，更是希望能将其修建得更加宏伟庄重。碑文中的记载也表明，他们不再仅满足于一个提供心安的信仰场所了，而是希望倾注财力与心力，将这座庙宇打造得更加完善。

此次扩建的顺利实施，表明了当时华人经济实力的飞速增长。碑文中“各捐所愿，运材琢石，不惜资费”⁴⁴的记载，正是他们经济实力雄厚与下定决心不惜钱财都要扩建的体现。此举不仅是为了完善广福宫，更蕴含着华人社会的文化意义。“前人乐建斯宫，今增而丽之”⁴⁵，字面上来看是在诉说前人为华人社群争取到了兴建这一座庙宇，而作为后辈的他们会继续将其修饰得更加完善完美。除此之外，更是表现出了一种延续和传承的观念，这些华人移民已经开始将槟榔屿视为他们的“家”了，不再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这不仅是对自身信仰的升华，也能提升华人在槟榔屿的地位，使其他族群更重视华人群体。

⁴²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2。

⁴³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2。

⁴⁴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2。

⁴⁵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2。



图3：1862年《重建广福宫碑记》

1862年广福宫重建皆因管理的董事们认为广福宫“年代久远，日就倾颓”，故需“更新之”。⁴⁶1862年广福宫的碑文中提到了“有事则解纷排难，同消雀角之争”⁴⁷，明确地表示了广福宫不仅仅是庙宇，更兼具调节华人纠纷、社群管理的功能，代表了早期华人群体逐渐有了自己机构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⁴⁶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537。

⁴⁷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537。

接着碑文上的“将见忠信笃敬，可行於蛮貊；睦婣任卹，旋覩於他邦”⁴⁸这一句，则体现了碑文寄望于广福宫的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更是道德教化与社群互助的中心，期望华人在异乡仍能以忠信立身、以关怀凝聚群体。

从经济层面来看，碑文上刻有的“因集腋以成裘，鸠工庀材”⁴⁹表明了华人社群乐意慷慨解囊去捐款给代表着信仰场所的广福宫做重建，说明了华人社区的经济能力一直在逐步提升。同时，这句“是宫既成，商民乐业”⁵⁰代表了广福宫作为一个信仰中心，为漂泊在外的华人社群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归属感。建庙不仅意味着宗教信仰的延续，更是社群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象征，体现了华人社群在槟榔屿逐渐安定下来的趋势。广福宫的建立让移民们在异乡拥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也成为凝聚人心、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基础。

综上，透过广福宫三次立碑的记录，可以清楚看出槟榔屿华人社群的发展轨迹。广福宫从最初抚慰乡愁的庙宇，逐渐演变成为调解纠纷、凝聚社群的公共空间。这一转变不仅得益于华人经济实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心态也随之改变：他们不再视槟榔屿为暂时停留的异乡，而是将其确立为长期发展的落脚之地。

⁴⁸ “卹”：异体字，现改为“恤”；“覩”：异体字，现改为“睹”。碑文内容摘自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7。

⁴⁹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7。

⁵⁰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页 537。

结语

本文以槟榔屿广福宫与其碑文为研究核心，探讨了槟榔屿从十八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入驻到十九世纪社会格局初步成型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华人社群的建构历程。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槟榔屿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治理前后从荒岛到国际贸易枢纽的转变。凭借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位置和自由港政策，槟榔屿迅速吸引了国际商贾并发展经济基础建设。这时，大量因战乱和贫困下南洋的华人移民成为重要劳动力和商业力量，不仅推动了殖民地经济繁荣，也塑造了多元文化格局。然而，移民潮带来的帮派与治安问题也成为社会治理的挑战。总体来看，华人群体在槟榔屿的发展中既是经济支柱，也是文化与社会结构形成的重要推动者。

其次，广福宫的建立与发展，是华人社会逐步扎根槟榔屿的重要见证。从最初为满足宗教与精神需求而兴建的庙宇，到一度成为华人事务协调与纠纷调解的机构，广福宫的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华人群体从流动性强的移民群体向定居社群的转变过程。随着平章会馆的成立，广福宫的仲裁功能逐渐淡化，但其宗教信仰与文化象征意义不断强化，成为华人社会凝聚认同的重要载体。这一个过程中折射出殖民地政府、华人社群与宗教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展现了宗教场所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另外，本文对广福宫碑文的细读，为还原槟榔屿华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碑刻捐款记录不仅揭示了闽粤移民在经济层面与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还反映了特定商业行业对社会与宗教发展的贡献。碑文中的词

汇与修辞，亦呈现了华人移民在陌生土地上对精神寄托与家园认同的追求，体现了他们逐渐将槟榔屿视为“第二故乡”的心态转变。

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对广福宫历史与碑记的深入分析，展示了宗教场所如何在殖民地社会中承担经济、文化与治理的多重功能，也为理解槟榔屿华社的形成逻辑和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广福宫不仅是槟榔屿历史的重要见证，更是海外华人移民在跨文化环境中延续传统、构建认同的象征。

引用书目

专书

1. 陈剑虹主编,《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 188 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 槟城: 广福宫信理部, 1989。
2.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 (第二卷)》, 吉隆坡: 马来亚大学出版部, 1985。
3. 林水壕、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 (第一册)》, 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
4. 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 新加坡: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2006。
5. 王琛发,《广福宫: 历史与传奇》, 槟城: 槟城州政府华人宗教事务理事会, 1999。
6. 谢诗坚,《槟城华人两百年》, 槟城: 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 2012。
7. 张少宽,《槟榔屿丛谈》, 槟城: 南洋田野研究室, 2005。
8. 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史话》, 吉隆坡: 燐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2002。
9.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Penang Past & Present.* Penang: City Council of Georgetown; 1996.
10. Dunlop, S., W. A. Pickering, V. Cousins, H. Hewetson, A. Knight and A. P. Talbot.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881* Singapore: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Press; 1882.
11. Innes, J. R.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901*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Press; 1901.

12. Merewether, E. M.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or 1891*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Press; 1892.
13.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81* Singapor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1882.
14.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译著

1. 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 槟城: 光华日报有限公司, 1950。

期刊论文

1. 阮湧伽、侯慧雯,〈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蔡士章与宝山亭之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2020年第1期,页47-73。
2. 张晓威,〈十九世纪槟榔屿华人方言群社会与帮权政治〉,《海洋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页107-146。

附录

附录一 捐献者记录



附图 1：1824 年捐献者名单与金额



附图 2：1862 年捐献者名单与金额

附录二 广福宫



附图 3：广福宫现况